

巴金的世界

〔日〕山口 守 坂井洋史 著



I206.7
S121

巴金的世界

——两个日本人论巴金

〔日〕山口 守 坂井洋史 著

東方出版社



20000198

责任编辑:黄金山

装帧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朱 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金的世界:两个日本人论巴金/(日)山口 守、坂井洋史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2

ISBN 7-5060-0714-2

I. 巴…

II. ①山…②坂…

III. 巴金-文学研究②巴金-生平事迹

IV. 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22669号

巴金的世界

——两个日本人论巴金

BAJIN DE SHIJIE

〔日〕山口 守 坂井洋史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5

字数:280千字 印数:1-2000册

ISBN 7-5060-0714-2/C·27 定价:19.00元

序

贾植芳

我所熟悉的日本同行朋友山口守先生早在今年4月就来信，说是他与他的同窗好友，也是我熟悉的另一位日本同行朋友坂井洋史先生，已经将他们近些年所撰写的巴金研究论文收集整理成册，交由东方出版社印行，并约我为它写一篇序文。

我得到这个信息后感到非常振奋。因为据我所知，外国作家和学者能为中国读者所认识与理解，一般都通过中国学者的译介这个渠道，即便他的著作在本国出版前可以先在中国出版（如50年代初，法国汉学家、天主教神父明兴礼〔Jean Monstereet〕研究巴金的著作《巴金的生活和创作》，这是他在中国传教办学时取得的学术成果，因而首先在上海出版，但也是通过当时在震旦大学任教的王继文教授的翻译的形式出现的）。因此，我得到这两位日本学者的专著直接以汉语表达方式在中国出版（其中大部分是他们自己用汉语写的，即使有些篇章过去曾以译文方式发表过，在此次收入专著时，也经过他们自己精心的校改），尤感振奋，同时又感到新鲜，因为这是出现在中国现当代出版界的新事物。不久前收到的韩国学者朴宰雨教授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赠书，这也是一本外国学者直接以汉语形式写作并首先在中国出版的汉学著作。因此，在我看来，这也应该是90年代新兴的学术风尚，它反映了随

着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和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外人民尤其是与我们一水相隔的,又在文化上具有渊源流长之关系的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正显现出一次文化交流上的深化和正常化的新景观。这是应该受到重视和欢迎的。

巴金,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巨大存在,他经历了 60 多年的文学生涯,其所创造的辉煌文学业绩,尤其是他的执著的人生追求、精神境界与人格力量,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也是整个人类的宝贵精神财产。因此,对这一巨大的文学存在或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是没有国界之分的。而山口守与坂井洋史先生的这部专著,其最大的特色就是首先着眼于对作为人的巴金的考察与研究,巴金的生命追求、思想信仰、生活经历与人生探索和体验是他们研究的起点和前提。

作为日本研究者,他们的著作重视资料的收集,鉴别与论证,不仅重视作家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同时也重视作家生活所涉及过的城市与乡村,对作家有一个整体性的观察与研究。如山口先生的《巴金在横浜》、《巴金在上海》,坂井先生的《巴金与福建泉州》等篇章,都体现了这种日本学者所特有的学术眼光。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将巴金放在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变革的大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放在中外文化、文学的交流、碰撞、融合的历史潮流中来认识,而研究者自己虽然作为异国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但他们生存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又广泛接触外来文化与思潮,是属于走出日本国门的知识分子,他们尤其对一衣带水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传统与现实,有着丰富的知识素养,又有在中国生活的深刻体验,以及与中国知识分子同行的比较广泛的交往与友谊,因此,他们对巴金的文学活动的体会与认识,就不限于书本范围之内就事论事,而是将巴金的著译和他参与的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在这两位学者的著作中,尤其显示出对巴

金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细致考察和评价,如山口先生的《巴金与萨珂、樊宰蒂事件》、《关于巴金与樊宰蒂往来书信》和坂井先生的《二
十年代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与巴金》等,不仅在资料的发掘与考据
上丰富了巴金研究领域的成果,而且也在对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思
潮的关系及评价上,提供了他们独到的识见。

他们的文化视野开阔,思路活跃,不仅选题范围广阔,角度新
颖,而且在治学方法、论点及评价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与优点,
富有自己的学术个性与风格。他们的学术成果,不仅开拓了巴金研
究的学术视野,也为世界性的巴金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积累。

我在生活的暮年有缘结识这两位日本同行与朋友,感到一种
莫大的慰藉和高兴,因为我们不只是学术事业上的朋友,也是生活
中的朋友。早在1978年秋天,即我经历了20多年与世隔绝的苦难
生活之后,刚刚告别了长期“苦力的干活”的劳改生活,在“解除监
督”的政策下,开始又由鬼变成人,回到原单位资料室工作。当时在
复旦大学外文系作为专家从事日本语言与文学教学活动的山口守
先生,因其专业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便在外文系一位教授的引
荐下,到中文系资料室来访问我。而在当时,我虽然解除了监督,但
头上仍戴着那顶戴了20多年的“帽子”;一般同事以至朋友仍把与
我的接触和交往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而山口先生却不避忌
讳,前来相访,并把我当做一个同专业的学术朋友来看待,虚心求
教,相互交流,这在当时对我是莫大的安慰,他也就成了我20多年
来第一次见到的一个外国朋友。后来他任教期满回国,我们便开始
了通讯联系。之后他屡次来中国参加学术活动,查阅资料或者观光
旅游,都成为我家的座上客。1990年秋天,我们夫妇应我的母校东
京日本大学之邀回校访问与讲学,当时山口先生就在那里任教,教
授中国语言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们夫妇在东京10多天的生活和
学术活动(包括到机场接送),无不受到山口先生无微不至的照顾

与帮助。我与坂井先生是从1989年秋天在青浦举行的首届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起开始交往的，尤其是90年代初，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复旦大学从事专题研究，我又挂名作他的指导教师，在他及其夫人在上海生活的1年间，我们除了在学术上的交流之外，因为都喜好杯中物，所以又成了酒友，古希腊学者说过，“酒中有真”，在杯来杯去中，我们加深了相互了解，为友谊奠定了基础。和山口先生一样，他们夫妇也是我们家中的座上客，我们并不把他们当“老外”另眼看待，我常常以聊天的方式，交流学术见解、生活见闻和感受。

正是因为这种友谊，使我在80高龄的年纪，不避酷暑，写下这篇称为序的小文，藉此也为我们之间的友谊留下一个永恒的纪念。

但我的体力与精力不允许我对他们两位的专著作深入细致的研读与品味，所以这篇短序，只是我凭藉对这两位朋友的认识和了解，在粗略地阅览后的一些浮浅的印象，又由于记忆力的衰退，因而难免会有信口开河、贻笑大方、文不对题之处，但我的心是真诚的，为了纪念我在晚年所结识的这两位常来常往的朋友，我信笔写下如上这些话，权作为纪念性的文字留在纸上吧。

1995年8月10日 上海寓所

目 录

序 贾植芳(1)

超越普遍性 山口 守

怎样理解巴金的文学 (3)

另一个《银河铁道之夜》 (15)

——巴金,其人与文学

巴金的文学与宗教 (31)

关于巴金的小说 (39)

试论巴金《家》的结构 (57)

巴金的《寒夜》及其它 (71)

巴金与上海 (80)

巴金在横浜 (95)

巴金与萨珂、樊塞蒂事件 (107)

关于巴金与樊塞蒂往来书信 (126)

关于 IISH 和 CIRA 所藏之巴金英文、法文书简 (146)

后记 (176)

巴金——丰富生命的追求者 坂井洋史

读巴金	(183)
——“违背夙愿的批判者”的60年	
二十年代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与巴金	(199)
关于《灭亡》	(229)
——巴金的“亡命”之含义	
巴金与福建泉州	(252)
巴金与“平凡人”	(316)
《憩园》论	(332)
——“侵入”与花园的结构	
丰富生命的追求者	(344)
后记	(348)
* * * * *	
深具学术意味的成功“对话”	李存光(358)
——《巴金的世界》书后	

超越普遍性

山口 守

怎样理解巴金的文学*

在香港的《大公报》上连载的《随想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巴金对解放后自己写的一些文章作了否定的评价。作为一位作家的回忆录或许这并无引人注目的新奇之处。但是，我对下述推论持有异议：即，巴金所言“我过去也是一个‘歌德派’”^①并不仅限于巴金一人，这多少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个成套。情报总是握于少数人之手，作家经常被时下的“政治”紧紧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作家即使不能说对政治亦步亦趋，也是“歌德派”。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特别是对于像巴金这样喊着“我是来学习的”^②的口号加入新中国行列的作家来说，相信党是不在话下的。可见他成为“歌德派”是顺乎自然的结果，也是出于无奈。

我认为以上的推论有重大缺陷。因为它忽略了作家本身这个主体。此推论的意图在于确定一个被“政治”挤压变形而又具有良心的作家的真实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想抹去“政治”色彩而把握巴金的完整形象。其实，这种观点出自主观臆断，只能使巴

* 原载日本《季节》第10号，1981年5月；中文译文收入《巴金研究在国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朱京伟译。在此所载译文经作者全面修订。

① 巴金：《豪言壮语》，载1979年9月20日香港《大公报》。

② 这是巴金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所作发言的题目。

金的形象更加含混不清。

巴金 1980 年 4 月 4 日在东京朝日讲堂所作的演讲中曾说：“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①我认为不应以对上述演讲文章的各种评论为出发点来推论，而应首先从承认文章所述事实这一点开始起步探讨。也就是说，把握巴金的完整形象要从他二十年代在《民钟》等杂志上发表拥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到其后写出《灭亡》、《家》、《憩园》、《寒夜》等许多作品；解放后又亲赴朝鲜战场采写报告文学；1955 年批判胡风，1957 年批判丁玲；文革中相信“四人帮”，而自身反遭迫害，失去妻子，到如今在回忆录中批判反省过去……等等，把所有这些巴金的经历联系起来考虑。我认为这对于完整地把握巴金文学至关重要，也是理解巴金文学的本质的唯一途径。寻章摘句的作法自然不能把握全貌。

巴金在香港《大公报》1980 年 10 月 20 日的《随想录》中写道：“其实我自己也有更加惨痛的教训……”这种表白充分体现了巴金其人的正直的性格。中国现代作家中几乎无人作出过这样的忏悔。不过在这里不是要议论他的“正直”，而是要研究巴金是如何从自己的经历中吸取教训的。因此我想就有巴金参与的对作家的批判“运动”作些分析。

1949 年以后巴金参与过的批判作家运动有 3 次。第一次是 1955 年对胡风等人的批判运动；第二次是 1957 年对丁玲等人的批判运动；第三次是 1965 年对电影《不夜城》的剧作者柯灵的批判运动。巴金曾指责“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本来面目跟别的反革命分子

^① 载《花城》1980 年第 6 期。

没有差别”^①现在对胡风尚无定论(据传已平反),巴金自己也至今未提此事。

巴金用了更为激烈的措辞批判丁玲:“她满脸污泥,躺在臭水里打滚,不管她真哭假哭也好,作‘抒情的独白’也好,她掩饰不了她那令人厌恶的丑态。”“她要在文坛上‘称孤道寡’,不能够平等地跟作家们坐在一起,她要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偷盗’勾当,所以就搞反党小集团来实现她的阴谋计划。”^②当时,巴金并未意识到这种认识背离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他还说过:“只有在党和同志们对他们进行了大量批判和揭露,我们才看清了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③文章的作者意在显示他们是如何受到党的教育,而我却认为这表明了他们丢掉了独立思考。

巴金认为应对自己的文章负责任,承认是错误的。对于和丁玲一起受到批判的冯雪峰,巴金在他的随想录《纪念雪峰》一篇中曾有所交代。此外,关于1965年对电影《不夜城》的批判,巴金在随想录的《“遵命文学”》中道出苦衷。文中写道,当时的批判文章里没点柯灵的名,以及某晚特意去柯灵家做解释等等,巴金的诚实性格跃然纸上。但是,如果从政治角度看,他曾说过:“不少工人观众对这部电影发出了愤怒的声音,他们有这样的权利。”^④可见他的看法来自对他所谓的“工人阶级”(说为“党”更正确)的绝对服从。这种绝对服从,当论巴金其人时时常被理解为人格的诚实。如果单就巴金的诚实态度而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个观点并未把这种诚实态度和巴金的文学相提并论。这样做只能是把巴金的文学创作

① 《“学问”和“才华”》,见《人民文学》1955年9月号。

② 《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家的路是绝对走不通的》,见《文艺报》1957年第21期。

③ 巴金、靳以《狠狠地打击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见1957年10月8日《解放日报》。

④ 《谎话一定要戳穿》,见1965年7月5日《文汇报》。

抛在一边，转而去谈论他的人格。

这种现象尽管形式不同，也反映在探讨巴金和无政府主义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例如有一篇最近的评论文章《试谈巴金的世界观与早期创作》^①，就是从对无政府主义的既有的观点出发来解释全部问题的，以至于对巴金文学作分析时，也用既定的标准去理解他的人格和思想。这一点和“文革”前发表的评论文笔基本相同。而谈到推论的严密统一，我觉得倒是像《巴金创作试论》^②、《巴金创作评论》^③（这两本书相比较，前者内容更充实一些）这些由学生编写的文章更出色。不过如前所述，在进行作品分析之前，已经由这些文章将争议的范围定死，以此为前提再进行作品分析也只能是发一通空泛的议论。可以说，这样的“作品评论”由于离开了巴金文学本身，使作品分析的想象力步入歧路而受到禁锢。

现在对巴金文学的评论除极少数之外，^④ 大都是离开文学本身去谈论巴金的人格和经历。因此，当巴金对自己在反右斗争时的文章表示反省时，马上就有评论说这体现了他的“正直”。我并未对巴金的正直持有异议，而是认为在评价一个作家时，这种正直应如何理解才正确。对此，我认为谈到他的“正直”，必须看到：参与批判胡风、丁玲的巴金和五十年代后期又被许多文章批判时作为改造自己而接受批判的巴金是同一个巴金。在巴金的精神世界中批判和被批判是不可分割的，说到底是一码事。他把现实的“政治”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他批判别人的文章同时又成为被别人批判的对象，这似乎在他的内心里与其说是矛盾，毋宁说是葛藤。

① 李多文《试谈巴金的世界观与早期创作》，《文学评论》1979年第2期。

② 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组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北师大中文系巴金著作研究小组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④ 《钟山》1980年第3期发表了唐金海的文章，《“挖掘人物内心”的现实主义佳作——评巴金的〈寒夜〉》，这一点上我对那种评论持有异议，这篇文章在评论的着眼点上与以前不同。

1958年巴金曾和其他作家一起写过文章,批判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Haward Fast)投降变节。他写道:“好些人对法斯特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感到惋惜。我也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个诚实的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悲剧是一般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不可避免的悲剧。”“但是我想大声提醒他,回头是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①这篇文章的调子要是和同期刊登的曹禺的文章《斥叛徒法斯特》相比,可谓相当的“宽大”。从中看不到批判胡风、丁玲时的激烈措辞,但与批判胡风及右派并无本质的不同。但文章发表不久,就遭到批判。1958年第11期《文艺报》以《〈对法斯特的悲剧〉一文的意见(读者讨论会)》为题刊载了3篇批判文章,同时也刊登了巴金对那些批判的看法。巴金说:“读者们的意见使我受到了一次教育……所以读者们的批判是有理由的。”从而全面地接受了对他的批判。这种态度是解放后的巴金的一个成套,也即前文所涉及的“正直”问题。

对《法斯特的悲剧》一文的批判以这样的观点为代表:“巴金忽略了一个人叛变的阶级原因,而只看事物的表面现象。这样看问题是很危险的。……但就作者的思想来看,我们觉得在这两篇文章里贯穿了作者的‘人性论’和‘爱一切人类’的超阶级观点。”^②1958年前后,在《文学知识》、《读书》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批判巴金作品的文章。这决非仅是由《法斯特的悲剧》引起的,而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相关,矛头对着巴金的“超阶级观点”。在上面引用的批判《法斯特的悲剧》的文章中提到了《丹东的悲剧》^③,此外,1958年在各杂志上被批判的巴金作品还有《灭亡》、《爱情的三部曲》、《家》等。对《家》的批评尤其多,可见他们对巴金文学要求的便是教育性。不

① 《法斯特的悲剧》,见《文艺报》1958年第8期。

②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巴金创作评论》。

③ 收入巴金《沉沦集》(二)中。

过《家》并没有作为“超阶级观点”的典型例子一概抛弃。被扣上“超阶级观点”的帽子而遭到批判的是《火》第三部。书中的主要人物基督教徒田惠世被认为是以“超阶级观点”描写的。巴金曾为田惠世的原型林憾庐写过一篇题为《纪念憾翁》的悼念文章，^①并在《火》第三部的后记中怀着哀悼之情写道：“现在让我把这象样的东西献给他在天之灵罢。”是什么把巴金和这个基督教徒紧密相连的呢？以下谈谈我的想法。

以前，巴金对小说《火》以及林憾庐谈得不多，可是最近却在香港的《文汇报》上读到了巴金亲自为《火》作的说明。另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艺丛》1980年第2期也登载了内容相似的文章。在此，我想以这些文章为根据看一看抗日战争时期巴金和林憾庐的关系。

在《关于〈火〉》一文中，巴金对《火》的第一、二、三部都作了说明，并记述了他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其中巴金反复谈到：冯文淑这个贯穿整个三部曲的人物是以他的妻子萧珊（原名陈蕴珍）为主要原型的。《随想录》中有一篇追思亡妻的文章《怀念萧珊》，可见其爱情之深厚。在《关于〈火〉》中有关萧珊的记述也很多。起初，萧珊只是巴金作品的一个读者，从1936年相识起到1944年与巴金正式结婚，有不少时间她和巴金生活在一起。对此巴金以前虽曾作过一些说明，但是1939年初巴金从桂林返回上海时萧珊与他同行这件事，这次却是第一次公开。巴金在《关于〈火〉》中谈到他1938年秋到武汉以及逃离广州时萧珊曾同行，而且1939年初巴金坐火车从桂林到浙江省金华，从那里（可能是乘汽车）去温州，再乘船返抵上海时她也一路同行。奥尔格·朗（Olga Lang）曾想从巴金的“重进

^① 收入巴金的《怀念》中，发表当初以《纪念一个失去的友人》为题，刊于《宇宙风》第131期。